

凯恩斯主义复兴与克林顿经济学

傅殷才 文建东

本文在概括西方经济学中“自由经营论”和“国家干预论”两大思潮兴衰交替的基础上,论述了当前凯恩斯主义复兴的原因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内容,论述了克林顿经济学的出现与凯恩斯主义复兴的关系。文章着重阐明了克林顿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和政策主张及其前景,认为凯恩斯主义复兴与克林顿经济学的产生,在美国是顺乎潮流的,但并不能根本解决美国经济中的矛盾。

凯恩斯主义在受新自由主义严重打击之后于90年代初显露复兴迹象,1993年克林顿上台全面推行与里根—布什新自由主义政策迥然不同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呢?这两种变化有何联系?克林顿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是什么,其前景将如何呢?

一、凯恩斯主义的复兴

从本世纪30年代初直到70年代中期将近半个世纪的时期内,传统的自由主义由盛而衰,长期处于弱小地位;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论由兴起到鼎盛,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战略与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这是西方各国,特别是英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自由经营论与国家干预论两大思潮兴衰交替的第一个回合。7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重整旗鼓,以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经济学)面目出现,卷土重来,在一些国家重新登上官方经济学宝座,这是两大经济思潮兴衰交替的第二个回合。

我们曾经说过:“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演变的趋势来看,新保守主义派的前景不会很美妙,因为他们在20世纪腐朽的、垂死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仍然在作17、18世纪自由放任,自由竞争的黄粱美梦,不懂得或者不愿看到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要长期取代凯恩斯主义而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宗,是很困难的。很有可能,新保守派不会有凯恩斯学派那种较长的得势时期,而凯恩斯主义会加以刷新,将以新的面目出现,甚至不能排除它东山再起。”^①事实正是这样,如果现在尚不能说已经发生相互换位的第三个回合,那末,不可否认,凯恩斯主义正在开始复兴,新自由主义的地位显得不稳。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社会经济原因的。

从根本上来说,在当前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不干预经济是不可能的。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正适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在实践上适合国家干预再生产过程采取一系列措施的要求,适合垄断资产阶级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需要。从这些方面看,凯恩斯学派的国家干预论是有一定“生命力”的。

从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也是有利于凯恩斯主义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与新自由主义的失误,为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和政策上走出危机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一时期,

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人数增多,企业大批倒闭,财政状况恶化。1989—1992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而1983—1988年为3.8%,从1989年第一季度到1990年第三季度的7个季度内,出现了经济增长的逐步停滞,在其后的两个季度内出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下降,1991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了0.7%的负增长。同时,失业浪潮席卷工业国家,欧共体12国失业人数近年高达1700万,平均失业率11%;美国失业率约为7%,失业人数超过800万,显然,这一时期主要经济问题是失业与停滞,这类似于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既然还是严重的失业问题,而以就业为主要内容、以充分就业为主要目标的凯恩斯主义重新引起重视,是势所必然的。

传统凯恩斯主义在70、80年代的危机,主要是因为政策上的失误和来自新自由主义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批评,在理论上受到理性预期学派的挑战,所促成的。这两方面的因素,在80年代末开始大为减弱。新自由主义因自己的政策造成的经济衰退而气短,对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批评不再理直气壮,其批评正确与否大受怀疑。在理论上,理性预期学派的新型宏观经济学在结构上结合宏微观之举,虽颇为新颖独到,引人入胜,但其经济均衡,政策无效的结论却与现实大相径庭,对凯恩斯主义的指责也显得软弱无力。

正因为如此,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它以“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或“新凯恩斯主义”的面貌出现,又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二、新凯恩斯主义—克林顿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复兴,并不是说它回到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而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用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萨缪尔森(P. Samuelson)的话来说,“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发展的科学,它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趋势的变化”^②。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凯恩斯主义的错误越来越明显,它的主流经济学的地位日益动摇,对它的反对者的意见不能漠然置之,因而吸收新学派的某些观点和理论,对自己的理论和政策加以改造,形成了所谓“新凯恩斯主义”。

这里所说的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ism)不同于50年代至70年代的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ism)。后者在使用上比较杂乱不清,有时泛指凯恩斯所有的追随者的理论,有时又特指新古典综合学派或新剑桥学派;前者则是在80年代中期继新古典主义(即理性预期学派)之后,作为凯恩斯主义的最新发展而兴起的。

当前的新凯恩斯主义的产生,起因于8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缺陷和70年代以来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失败。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理论缺乏微观理论基础,它假定工资刚性,进而假定市场不能出清,并以此说明失业的存在与持续,但没有从微观上论证工资刚性的原因。那时的萨缪尔森等人虽然把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理论结合到一起(萨缪尔森第12版以前的《经济学》就是这样),但二者是机械的组合,而非有机地联系为一个整体,至于新古典主义,尽管已经明确地把微观理论作为宏观理论的基础加以分析,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微观分析中推导出宏观理论,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理论,但它假定市场出清的微观分析是不现实的,经济稳定、政策无效的宏观结论缺乏说服力,这已由经验和研究结果所证实。新古典主义的另一缺陷是,由于大量使用高深的数学与经济计量学而难以简化为简单的模型,鲜为人们所接受和了解。这两方面的缺陷,使它未能成为主流,而只是改变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结构,指明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的成功方面,促使一些经济学家沿着新古典主义方向构建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而新古典主义失败的方面则引导这些学者另辟蹊径,对劳动

市场进行微观分析,作出与新古典主义迥然不同的工资价格刚性和非市场出清的假设,并把它结合到宏观理论中去,从而得出凯恩斯主义的结论,这就是新凯恩斯主义。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同样经历了上述的演变过程,以前他把自己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称之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或“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从1985年的第12版他改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

“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与“新凯恩斯主义”演变的基本趋势和基本内容,大体是一致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 “新凯恩斯主义”致力于构造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在宏观机械组合的基础上,努力使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把总供给和总需求(AS—AD)作为理解价格和国民产值的总体变动的核心方法,宏观经济学中的所有重大问题都用这些新的工具加以分析;同时认为,供给和需求概念是掌握和分析微观经济学的各个部分的主要工具,对理解增长、发展、国际贸易问题和平等与效率的争论都是必不可少的。当今的萨缪尔森写道:今天,微观经济学包括了一个国家所面临的许多争论最激烈而又最重要的问题。应用微观经济分析工具,我们可以说明为什么从1973年到1979年石油价格上升了10倍。而在1984年又下降了。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美国的钢铁和汽车行业受到外国的竞争——而且,我们同样可以了解为什么某些人想要限制这些产品进口;“没有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也不可能了解收入分配;^⑤。他认为,为了深入了解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必须以微观经济学作为基础。

2. 新凯恩斯主义吸取了新古典主义的长处,“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则“把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凯恩斯主义、古典学派(即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说——引者)、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以及现代宏观主流经济学——总合在一起”^⑥。具体地说,它吸取了现代货币主义关于货币政策重要性的观点,在其总需求理论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它吸收了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关于总供给的理论,并构成其宏观经济理论的两个重要支柱之一;它保持和发展了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微观经济理论。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W. D. Nordhaus)自鸣得意地说:“我们两人都可以证实,重新综合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种激动人心的体验。这种综合审慎地考虑到经济学中竞相争鸣的所有流派:后凯恩斯折衷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芝加哥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经济学”^⑦。

毋庸置疑,“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仍然是凯恩斯主义,确切些说,是“新凯恩斯主义”。这种新的综合,反映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各个学派和各种理论有融合的趋势。

当几十年前萨缪尔森开始写作《经济学》(1948年出版第1版)的时候,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J. K. Galbraith)就预言,下一代人将从这一著作中学习经济学。显然,克林顿政府这个年轻的班子是遵循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的,不过如同其他许多的西方资产阶级政府一样,虽然在某一时期信奉某一学派,但并不绝对皈依这一学派,而是博采众长。

三、克林顿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

1992年11月3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当选为美国第42任总统。大家知道,美国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是轮流执政的。一般说来,民主党信奉国家干预论,共和党遵循自由经营论。克林顿是遵守民主党传统的,他的竞选纲领《把人民放在首位》和1993年2月17日呈交国会讨论表决的经济纲领《美国变革的前景》中,提出了自己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其内在逻辑与思路就构成克林顿经济学。大致说来,克林顿经济学是新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型的。

克林顿经济学的基本点是：政府必须干预经济，尤其是财政干预，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波林(R. Pollin)指出：“克林顿作出的第一个基本变革，就是认为联邦政府应做一些有益的事，来使经济走上更有利的增长道路。”加尔布雷思也认为，即使在经济开始显示复苏的迹象时，加强政府干预仍然是克林顿政府应做的事。克林顿政府加强干预经济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银行体系疲软，生产能力继续闲置；另一方面，干预比不干预在政治上所冒的风险要小。1994年为国会选举年，如果政府不干预，经济再度衰退，就会得不偿失，若政府刺激经济，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率，是不会招致通货膨胀危险的。

在上述基本考虑支配下，克林顿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其思路是进行改革，长短期兼顾，双管齐下：既要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又要削减赤字，压缩债务；短期内用财政刺激促使经济复苏，增加工作职位；长期内则逐渐减少赤字，增加政府公共投资，以维持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这就是克林顿经济学政策的核心，加尔布雷思称之为双管齐下的增长战略(two-track growth)，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 短期财政刺激。克林顿计划在执政的头两年内，增加31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以缓解900万人的失业，其中第一个财政年度支出163亿美元用于修建高速公路、暑期青年就业、社会开发、自然资源保护和长期失业者的失业救济。其余150亿美元用于税收减免，主要是为小企业更新设备提供投资税减免，以刺激投资。

克林顿政府的这项政策，其目的是增加就业职位，促进经济复苏。虽然短期增支与削减赤字背道而驰，但这在经济增长乏力，失业大量存在的形势下是非常必要的，克林顿基于两点考虑而决定这一策略：扩大就业，提高生活水平，以缓解公众对增税的反感与抵触，博得他们对长期削减赤字计划的理解与支持；同时推动经济迅速回升来为长期赤字削减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短期财政刺激计划中的私人投资税收减免主要是针对小企业的，因为克林顿深信，大量的小企业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萨缪尔森对此评论道，暂时增加赤字可刺激就业，就业增加有助于随后的赤字解决。

2. 长期削减赤字计划。削减预算赤字，减少政府债务，是克林顿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克林顿计划5年内共削减赤字4960亿美元，其中1997年削减赤字1450亿美元，占预计全部赤字的一半。这项计划通过4年内增税2460亿美元，节支2530亿美元来实现。(1)增税计划：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对年收入超过4万美元的家庭，税率由31%升到36%，超过25万美元者再加征10%的附加税；提高公司所得税，对年利润超过1000万美元的大公司税率由34%提高到36%，同时对外国在美国的公司征收附加税；增加能源税，平均税率为5%，以增税200亿美元；对富有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收益征税，最终将85%的社会保险收益用于计征税收；扩大低收入者税收的减免，以抵消能源税的影响。(2)减少开支：国防开支4年内再削减760亿美元；非国防开支削减540亿美元；其它费用如社会保险、医疗服务和退伍军人安置费等政府津贴，减少910亿美元；冻结联邦工作人员(军人、邮政人员除外)工资一年，以节支83亿美元；减少联邦政府经常开支，白宫带头裁员25%，联邦政府裁员10万，以减少12—14%的经常开支。

克林顿政府急切削减赤字，原因在于，里根、布什时代积累了巨额的赤字与债务，占用了私人生产资金，高债务导致的高利率排挤了私人投资，减少了居民消费(阻碍了抵押贷款的住宅、汽车购买)，增加了贸易赤字，最终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同时，巨额赤字负担与利息支付使政府得不到足够的资金和民众的政治支持来推行财政政策，所以削减赤字势在必行。在赤字削减的措施中，加尔布雷思认为增税比节支更为可取。这是因为大部分税收都是一次立法，多年有效，对税法的修改，总统可行使否决权；相反，支出是逐年决定的，难于大量削减。

3. 长期投资计划。4年内计划投资1600亿美元,以削除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的负债投资,其中4年内将总计480亿美元的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如高技术产业、交通、通讯、环保、能源、住房及社区开发,此外还要投资于教育、职业培训、研究与发展来开发人力资源。长期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加强经济实力,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投资方向主要是基础设施、教育培训、科技开发,这充分体现了克林顿以政府力量调整产业结构、开发人力资源的决心。事实上,克林顿认为产业结构不合理是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国际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人的素质与技能是最宝贵的资源,是经济振兴的根本动力。在人力资源上克林顿深受哈佛大学教授、现任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 Reich)的影响,后者认为,在全球性无国界的经济中,只有人及支持人的基础设施,才是不会流失的资产。

4. 改革税收体制。削减赤字的主要措施是增税,克林顿把增税与税制改革联系在一起,主张增加对富人征税进行再分配。其根据是,经过里根政府减税之后,美国税收体制被认为是不合理、不公平的:与其收入相比,95%的人负担偏重,5%的富人负担偏轻。很多人对此不满,认为里根减税是劫贫济富,并因此而逃税或退出纳税性经济活动。一项调查显示,美国逃税人数在增加,其中38.9%的人因感到不公而逃税,33.3%的人因认为负担过重而逃税。因此,若不进行税制改革,增税极为困难,必须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在克林顿增税计划中,中下阶层所受影响极小,虽然因能源税受到损失,但又在税收减免上得到补偿。

5. 改革福利制度。克林顿主政之前的美国有3500万人不享受任何医疗保健,克林顿认为这既不公平,又使现行制度无效率。于是他强调建立更广泛的高效的医疗保健网络,雇主应为职工提供更多的医疗保险。

6. 外贸政策。扩大对外贸易,拓展国际市场,是克林顿经济战略和对外政策的一个支柱。克林顿主张“公平的自由贸易”,“致力于扩大出口和公平自由贸易来取得经济增长。”实际上,他是在竞争力强的情况下强调自由竞争,在竞争力弱的情况下强调公平贸易,实行保护政策,希望扩大出口,刺激需求,实现复苏。

除了上述措施,克林顿政府在国内经济领域还陆续提出建立全国性电子通讯网络、刺激与推动官民结合研究开发新技术、加速政府对民间企业的先进技术转让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

以上就是克林顿经济学及其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关于其性质,克林顿自己说:“我们的政策既不是随便的,也不是保守的;既不是共和党的,也不是民主党的。我们的政策是新的,是与以往不同的。”“是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就是说,他认为自己的政策是介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折衷主义经济政策。但从其政策构想与思路中可以看出,克林顿经济学是非常接近凯恩斯主义的,其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与凯恩斯主义理论和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如出一辙。因此,尽管克林顿本人未明确认同凯恩斯主义,我们还是有充分理由认为其政策从思路到措施都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的,不管二者殊途同归也好,还是相互影响也好。具体说来,其理由如下:(1)克林顿强调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如刺激经济,指导产业结构调整等,实际上这是承认市场机制与自由放任的失灵。(2)在国家干预中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制订了详尽的财政措施。(3)在财政政策中强调公共投资的刺激作用与乘数效应。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布林德(A. Blinder)认为:“克林顿经济学的实质,就是通过投资取得经济增长的政策。”这种投资包括短期刺激与长期调整产业结构,短期刺激含增加政府投资和减免税收,是典型的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长期投资也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长期增长政策。(4)税收政策方面强调了收入再分配,这就一改新自由主义强调效率优于公平的作法。(5)福利制度改革中既强调了福利措施,又增加了对私人企业的干预,一反供给学派的精简规章制度给

企业松绑的做法。(6)外贸政策上倾向于保护主义。(7)始终以充分就业与增长为目标,未过多强调通货膨胀,这实际上认为在衰退时和复苏中不会有过高通货膨胀压力。十分明显,上述各个方面,都是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当然,克林顿经济学中也包括改革福利制度、精简政府机构、削减赤字、增加供给能力(长期投资的目的)。这些似乎是其它学派特别是新保守主义经济学派所强调的,但凯恩斯主义者也都能够接受。“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正概括了他们对其他学派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特征,故克林顿的这些政策虽体现了其综合补充其他学派的主张,但仍不失为凯恩斯主义的。如就赤字削减而言,虽然新自由主义极力主张削减赤字,但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里根、布什在任期内却任赤字翻了两番,凯恩斯主义虽然主张以赤字促增长,但也不愿看到巨额的赤字。

正因为克林顿经济学具有凯恩斯主义的倾向,早在当选前,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著名代表如阿罗(K. Arrow)、托宾(J. Tobin)、索洛(R. Solow)、克莱因(L. Klein)、莫迪利安尼(F. Modigliani)和萨缪尔森等人就在《挑战》杂志上联名公开对克林顿的竞选纲领表示支持。新凯恩斯主义代表如乔治·阿克洛夫(G. Akerlof)以及其他主张国家干预的著名经济学家如加尔布雷思等,也都签名附议支持。

因此可以认为,克林顿经济学的得势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的复兴:新凯恩斯主义与传统凯恩斯主义构成这一经济学的直接基础。

四、克林顿经济学说及其政策的前景

克林顿政府上台不到一年,对它的业绩进行评价尚为时过早,其成败还难预料。不过,从根本上来说,问题是很清楚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各国内部矛盾激化,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危机加深,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及其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后果,是任何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无论是里根、布什还是克林顿,都是不能解决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政府均无所作为,不能缓解其矛盾,促进经济发展。

从长远的角度看,克林顿经济计划方向是对的。其一,削减赤字势在必行。在里根、布什的12个财政年度内,美国联邦赤字累计高达2.3亿美元,1992年的赤字达3千亿美元,国债增至3.97万亿美元,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1981年的26.5%上升到1992年的51.1%,巨额赤字与债务挤占生产资金,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大障碍,导致美国经济实力下降,也使政府无力对经济进行干预。虽然赤字削减短期内可能不利于经济复苏,但为长远计,却必须削减赤字以轻装上阵,加强经济活力。其二,美国产业结构老化,是其经济增长乏力、国际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因而长期投资也极其必要,况且其中许多投资来自冷战结束后军费开支的缩减,不至于成为削减赤字的阻碍。

克林顿执行计划的环境存在着一些有利的因素。例如,削减赤字会减少需求,是一种紧缩性力量,为了经济不至于衰退,需要配合以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作为补偿,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R. Greenspan)明确表示,将以货币政策加以支持。目前看来,利率水平已达到20年来最低点。又如国际市场上,象石油和原材料初级产品的价格这一段时期尚属平稳,经济增长在加速,第一季度虽然增长缓慢仅0.7%,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增长了1.6%。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下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加快,原因是利率极低且可能继续下降,低利率刺激了投资与住宅消费,上半年制造业已增加就业人员110万。但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如民众的支持与信心有所下降,短期财政计划搁浅不利于经济复苏,今年前5个月外贸逆差达445.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296.5亿美元增加近50%,所以经济学家对全年增长率的预测普遍低于年

内预计的 3—3.5%。事实上,今年上半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只增长了 1.4%。

另外,克林顿的具体措施的落实效果也颇有问题。1. 削减赤字从长期来说固然是必要的,但短期内既抑制需求,又使财政调控能力下降,不可避免地会阻碍经济复苏,经济难以复苏,反过来又影响到中长期赤字削减,经济增长与赤字削减看来难以两全,不好协调,这就陷克林顿于两难困境。削减赤字虽然降低利率,有利于外贸出口,但外贸差额正负还取决于国际市场情况如外汇是否贬值,取决于国际市场的配合。克林顿的挚友、有活着的凯恩斯称号的现任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就批评克林顿计划中赤字削减过大,不利于经济增长。不过,《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分析表明,削减赤字只会轻微地限制今后 4 年的经济增长,不至于重陷经济衰退。但无论如何,削减赤字不利于短期经济回升,也因此而反过来大受掣肘,难以落实。削减赤字的另一阻力是美国赤字与债务巨大,积重难返,很难迅速减少。根据美国管理与预算局的分析,即使克林顿计划奏效,到 1997 年之后赤字又将因巨额的政府保健支出而再升至 3000 亿美元。2. 克林顿的长期投资仍然嫌少。有人认为,克林顿每年增加投资 200 亿美元,低于以前每年减少的 600 亿美元,而且公共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也在下降。3. 税收计划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其一,所得税率高于资本收益税率,这会使纳税人将工薪收入转为资本收益;其二,资本收益税率低对投资的刺激作用,证据不明显;其三,公司税率的提高可能会以高价格低工资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其四,对小企业的税收减免不一定能大量增加就业,因为大企业提供的就业职位更多一些;其五,能源税的实施将使通货膨胀率到 1997 年提高约 0.3%;其六,克林顿希望以石油税两倍于其它燃料税的办法来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和促使消费者由消费汽油转而消费其他燃料,看来由于税收规模,这一预想难以实现。4. 大幅度削减支出尤其是军事支出,从长期看有利于赤字削减,但短期内会引发相关部门的衰退,造成众多的结构性失业。相应地,政府要增加失业救济金和职业培训费用,这又阻碍了支出的降低与赤字的削减进度。

总之,对正在执行中的克林顿计划,可用他本人的话来概括:“方向正确,成果不大”。不过应当再加上一句:步履维艰,命途多舛。

综观凯恩斯主义的兴衰演变历程可知,某一经济学的流行与消失,兴盛与危机都是与经济形势的变化,与其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与其政策执行的效果,是紧密相关的。我们认为,总的来说,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既不能实行纯自由经营政策,也不能实行纯政府干预政策。对当前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来说,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论的主张要比新型自由经营论的自由放任的主张更现实些,因为理论与实践业已证明市场的失灵,因而需要国家干预,关键是干预的具体措施、程度和范围要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能一成不变。虽然里根与撒切尔执政初期取得一些成果,那也只是对国家干预过度的一种纠正,而又是矫枉过正,从而导致 80 年代后期的衰退。可见,问题不在于是否干预,而在于如何干预,在于如何使政府干预与自由经营结合得更好。显然,凯恩斯主义的复兴与克林顿经济学的产生,在美国是顺乎潮流的。

注 释:

① 傅殷才:《论凯恩斯学派的兴衰及其演变的趋势》,载 1987 年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论丛·经济学专号》。

②③④⑤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 12 版)上册,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第 2、620、2、21 页。